

Verwandten au

17—19世纪的 德国语言学 与中国语言学

小學考者補秀水朱氏
次爾雅二卷而形聲韻
原自言隸辨一書有
於帖括之習沿襲
習沿鑒師音義
及往往侈談復古
訂同異而於音
聲小學考序

本书为国家教委“八五”人文社科规划项目

中西语言学史断代比较研究

17—19世纪的
德国语言学与中国语言学

姚小平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京)新登字 15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7~19 世纪的德国语言学与中国语言学/姚小平著.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12
ISBN 7-5600-2137-9

I . 1… II . 姚… III . ①语言学史 - 对比研究 - 汉语、德语 - 近代 ②语言学史 - 断代学 - 对比研究 - 中国、西方国家 IV . H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8136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17~19 世纪的德国语言学与中国语言学

姚小平 著

* * *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址: <http://www.fltrp.com.cn>

印刷: 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25

字数: 389 千字

版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书号: ISBN 7-5600-2137-9/H·1131

定价: 19.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自序

中国古时候并无“语言学”一称，略等于语言学的学科是“小学”。

一门学科在学术体系中的地位，会因社会的剧变而大变。今天的语言学纵可自诩为“领先的科学”(pilot science)，也不过是数十个学科中的一门，换言之，语言学在我国现代学术体系中所占的比重只有零点几成。从每年下发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或教委人文社科基金的课题申报指南，便能看出这一点。古时的小学却是另一番景象。经过两千年的发展，及至清代，小学在学术体系中至少要占两三成比重；而它与经学联手，可以说占取了清代学术的九成天下。我们看有清一代，大学者中有几个不是经学家？经学家当中，有几个不兼治小学？那时的小学，何止是领先！它是一门领路的学科，一门导向至理大道的基础学科。戴震的一段话，最能说明这个意思：“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古经解钩沉序）

今人要想认识中国古代学术史，不先入小学史之门，势必难以如愿。小学配合经学，构成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这样一种学术格局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初叶。当时的一些思想家、大学者，如梁启超、王国维、陈独秀、胡适，承继了这种传统学术的遗风，对小学抱有浓厚的兴趣。然而也正是在他们的时代，中国学者开始营建“语言学”。而一旦汇入西学体系，小学在中国学术体系里的比重便迅速降低，不再担负领路的大任了。如今仍有不少学者在从事过去属于小学范围的研究，但已没有人再称这种研究是小学。取而代之的是“古代语言学”、“传统语言学”、“传统语言文字学”一类

等义的学科名称。其实，怎么命名是次要的，要紧的是应看到，小学作为中国旧学的主体成分，从对象、工具、领域划分直到理论方法、哲学认识、科学背景，以及教育体制、建制组织等等，都不同于本属西学范畴的语言学。

传统对现代的影响是深远的。今日中国的语言学，多少仍受到小学传统的约束，其特点须从历史上寻求解释。例如中国语言学者对形上问题无大兴趣，偏于具象分析，就不仅仅是这一代人的毛病。今天我们回过头看清代小学，在这面历史的镜子里照出的一半是我们自己。当然，传统的影响或约束并不都是消极的，传统小学的成绩也是不应小视的。在语言总体的认识和探索上，清代小学家固然落后于同时代的西方语言学家，但在自身已有的基础上，清儒无疑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生当今世，我们尽可以历数清儒的种种缺失，可要是让我们（也包括我自己）处在他们的时代，恐怕是会远远不及他们。我们身上还有多少敬业态度，进取精神？我扪心自问，惟有愧怍。学术在他们是性命，在我们是商品；他们著述，是因为有得于心，我们著述，是为评职、为收入；他们崇尚读书等身，我们追求著述等身；他们用三十年写一本书，我们用一年写一本书；他们以质评价论文，我们以量统计成果，如此等等。旧学和传统一再遭到批判，旧时的学风学德却未能得到弘扬。我们常常羡慕西方学界的民主氛围和批判精神，但我们何不近取诸身，学一学顾炎武、颜习斋、章学诚？

顾炎武说，“其必古人之所未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日知录）

颜元说，“立论但言是非，不论异同。是，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也；非，则虽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岂惟千万人，虽百千年同迷之局，我辈亦当以‘先觉觉后觉’，不必附和雷同也。”（言行录）

章学诚说，“君子之学，贵辟风气，不贵趋风气也。”（文史通义）

愿以先贤的哲言，与今日的同志共勉。

目 录

1. 释题	1
2. 十七、十八世纪的德国语言学	7
3. 十九世纪的德国语言学	33
4. 科学与语言学	73
5. 学科建设与建制	116
6. 清代中国语言学的社会背景	142
7. 清代教育和学术建制	153
8. 图书与学术	181
9. 清代语言学的领域和著述	199
10. 清代语言理论	241
11. 清代语言研究方法	264
12. 梁启超论清代学术特点	273
13. 胡适评清代学术	291
14. 王力论清代语言学和中国古代语言学的特点	305
15. 吕叔湘论中西语言研究传统的差异	315
16. 周法高论中国语言学史	318
17. 旧文一篇:论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特点	323
18. 何九盈论中国古代语言学	332
19. 总结:清代语言学的特点和短长	342
后记	356
参考书目	358
附录一 部分清儒生卒表	371
附录二 中西语言文化大事年表	378
人名索引	452

1. 释题

1.0 中西比较，一个吸引人的话题

中国和西方的语言文化差异很大，二者走过的语言研究道路自然也很不一样。关于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特点，以及中西两种语言研究传统的差异，过去王力（1981）、周法高（1980）等曾经谈到。比如周法高（1980:2-6）总结出了四个特点：1) 重实用；2) 重古代；3) 重文字；4) 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异族传统）的优点。我自己也专门写过一篇文章（1994），提出中国传统语言学有三个特点：1) 重“为学”，轻“为道”；2) 重文字，轻语法；3) 重本族语，轻异族语。（见本书 17.）

这类评说，包括我自己的评说，其实只是些空泛的论断，多半是根据历史留给我们的印象和我们对中西差异的直觉得来的。而印象和直觉有时虽然碰巧是对的，有时则会使认识产生偏误。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我们需要做更系统、更具体的比较，从历史上搜寻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1.1 比较应是系统的比较

首先，既然我们对比的是两种语言学的传统，那就应该关注语言研究的各个领域，而不是只在某个方面做文章。就某个方面看，一种传统可能长于另一种传统，或没有明显的差别，但从其它方面来看或许并不如此。只有在对比了语音学、词汇学、词典学、语法学、语言本体思考、外语研究、语言教学等各个领域之后，才能辨别

出两种传统各有哪些特点，在哪些方面各有短长。

其次，虽然我们比较的是语言学的传统，却不应该把自己圈死在语言学这块地盘里。一种语言学传统的形成和发展，除了受制于自身的原因外，也取决于它跟相邻学科的联系，取决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哲学思想和方法，取决于教育、建制、科研环境等一系列外部因素。只有在社会—思想史的大系统里，才看得清一门学科史的来龙去脉。不论考察西方语言学史或中国语言学史，还是比较中西语言学史，我们都应该拓宽视野，超越本学科的界域，在历史的解释中求得更高层次的系统性。

语言学史是整个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史的组成部分，这个道理很明白。问题是，狭义的语言学史好写，比较起来也还容易，但一提到思想的高度，涉入社会的作用，事情就立即变得复杂起来，需要考虑的因素太多，太多。我们当然不可能面面俱到，但是我们需要为自己确立一个考察和比较历史的远大目标。也许这个目标理想主义色彩很浓，不过有它总比没有好。

另一方面，由于目标很大，不易下手，就有必要使研究具体一些。这意味着，比较的范围要缩小，对象要更具体。

1.2 比较的时空范围宜缩小

就整部语言学发展史来讨论中西两种传统的差异，时间跨度太大，考察不易深入。不如选取一段历史，一个特定的时期，这样就可以把比较做得更细，结论因此也会更可靠。比如，可以拿西方古典时期（希腊罗马）的语言学与中国上古时期（先秦两汉）的语言学作比较，这两个时期在时间上是基本对应的。

但我选择了 17—19 世纪。17—19 世纪，或可称“近代”，跨度大抵相当于晚明和有清一代。我之所以选这段历史，是出于这样一个认识：在这个时期，西方语言学和中国语言学不约而同，都攀上了前所未见的高峰，充分显露出各自的学术传统中孕含已久的

特性；中国语言学与西方语言学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碰撞，相互渗透。在这一时期，中西两种传统比先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有更多的可比之点。

时间上范围缩小了，接下来就要考虑在地理空间上把比较的范围缩小一些。

人们喜欢谈论中西差异，可是“西方”实际上是个笼统的概念。我们平常言及中西差异，说西方如何如何，中国如何如何，往往不大注意对“西方”这一概念作历史的辨析界定。回到两千年前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那时的“西方”是一个单极的世界，没有重大的内部文化差异。后来，希伯来要素融入希腊罗马传统，形成一种《圣经》文化；这种融合是有机的，也没有导致“西方”文化的内部差异。到中世纪，“西方”基本上仍是单极世界，有统一的宗教、统一的哲学、统一的学术语言和教育体制。但是，自文艺复兴起，民族国家相继形成，新兴民族的语言逐渐取得独立的政治地位和学术地位；加之宗教改革运动导致信仰和思想分化，科技进步使少数国家先期发达起来，“西方”于是不复为单极的世界，内部文化的差异也开始加大。

以哲学史来说，古希腊可以跟先秦比较，罗马可以跟两汉比较；中世纪跨度很大，取其中间一段的话，可以跟宋代比较。但近代却不大好笼统地拿来跟清代比较了，因为西方哲学到这时已分出英国哲学、法国哲学、德国哲学等等。合理的比较应该是“英国哲学（或法国哲学、德国哲学）与中国哲学”。

语言学史的比较也是如此。进入近代，西方语言学已明显有国别之分，不再像中世纪时那样统一在拉丁语的工具之下。从哲学认识、研究取向到科研机制，欧洲各国都有区别；语言研究成为母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语言学的民族色彩越来越浓厚了。这种情况下，拿中国语言学与泛泛而言的西方语言学作比较，不区分西方语言学内部的民族流派，便不很妥当。而且，“西方”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包括多种语言，如果笼而统之，就材料来说

也难以把握。

所以,如能把空间范围缩小至西方一国,比较的对象就具体得多。问题是,近代西方各国都有自己的语言学,我们选择哪一国才好?

1.3 比较须是典型的比较

我们需要把比较的对象具体为一个国家,但又不宜随便拖出一个国家就来比较。我们选择的这个国家,它的语言学应该能够代表当时西方语言学所达到的最高水平,能够反映出西方各国语言研究的一般状态和共同走向。比较应该是典型的比较。如果我们选择意大利(意大利语言学也有自己的历史和特点,可以视为一个民族流派),就没有典型意义。选择法国或英国,也不够典型。最典型的是德国:特别是近代后期,德国无疑是西方语言学最为生动活跃的舞台,一系列重头戏都是在那里先唱起来。人们常说,德国是普通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源地,普通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作为独立的学科,正是在18—19世纪的德国形成的。仅此一点,已能说明德国当时在语言学上领先于其它西方国家。

一方面,我们认为近代西方语言学并不统一,有民族之分;另一方面,我们却试图寻找一个典型的国度,想通过它窥测整个西方的语言学。这样做是不是有些矛盾?这的确是个矛盾,但我想它不至于妨碍我们的研究。任何比较都是要通过部分事例认识全体,所以都有以偏盖全的危险。如果有人愿意,他可以把近代英国的语言学拿来跟清代中国的语言学做比较,其他人则可以去比较法国语言学、北欧语言学等等,然后,把大家分头研究的所得合起来,就能更全面地再现那一时期西方语言学的面貌,到那时我们的比较也就真正称得上是中西比较了。目前似乎还没有人做这种断代的、国别的语言学史比较。

1.4 比较研究的目的和步骤

最早想到对中西学术思想史作断代比较的中国学者是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的自序里他说，要“……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佐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虽然他是拿清代跟文艺复兴相比，并且只是限于泛论，我们从他的论述中仍可以获得不少启发。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里，他对明末中西学术交锋有更具体的描述，另外也专门讲到清代的语言研究（第十三章讲小学和音韵学，第十四章讲古籍校勘辨伪）。我们比较近代中西语言学史，最终目的也是要像梁启超说的那样，“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

本项研究将分四步进行。

第一步：概述 17—19 世纪德国社会状况；阐述此时期德国语言学关心的问题，各领域的主要成就，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分析科学在德国语言学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考察德国语言学形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过程，探讨影响学科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建制因素。

第二步：概述明末清初中国的社会状况；考察清代的教育体系、学术建制、图书类型；综观清代语言学的研究对象、领域和著述；探讨清代小学家的理论建树和研究方法。

第三步：评介梁启超、胡适、王力等人关于清代学术和清代语言学的论述。

第四步：从研究对象、工具、方法和领域，以及理论体系、建制条件诸方面入手，对清代语言学和德国语言学作一比较。

我希望，在这项研究结束时，我们能在以下诸问题的认识上比前人略进一步：

- 攀上中国传统语言学发展顶峰的清代语言学，其特点究竟何在？
- 比之西方语言学，清代语言学有何不足，有何长处？

- 哪些因素制约着清代语言学的发展？哪些因素是决定性的，哪些是次要的？

.....

2. 十七、十八世纪的德国语言学

2.0 我们要比较的是 17 世纪初到 19 世纪末中国和德国三百年的语言学史。本书末尾附有一个表，读者从那上面可以看到 1600—1900 年期间中国和西方特别是德国所发生的大事情。在做表时选取三百年这一整段时间，只是为求方便，在实际考察中我们则不应该也不可能把历史切割得那么整齐。

作为第一步，我们先简述一下 17 世纪德国的社会状况。

2.1 十七世纪的德国：战争，分裂，落后

公元 962 年，萨克森公爵亨利之子奥托在罗马由教皇加冕称帝，史称奥托一世(936—973)。从此开始统治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名义上持续存在了八百余年。但从 11 世纪起，德意志皇权逐渐削弱；13 世纪中叶，各诸侯邦国的边防、审判、铸币、关税等权利已得到帝国法律明文认可。到 17 世纪上半叶，欧洲爆发三十年战争(1618—1648)，整个中欧有 15,000 个村庄毁于战火，德国人口由 17,000,000 减少到 8,000,000 万。战争使法国和瑞典成为欧洲大陆强国，使瑞士、荷兰从德意志帝国集团中分离出去，成为新兴的民族国家。而德国呢？在今天奥地利和德国的土地上，那时竟有大大小小 360 多个自主的王国、公国和自由城市。德意志人不仅没有英国人、法国人或瑞典人那样的集权国家，甚至也不成其为一个统一的民族。

所以，当我们说到 17—18 世纪或更早一些的德国时，指的实际上许许多多讲德语（那时也叫条顿语，Teutsch）的邦国。这些邦国有的结成同盟，共同御敌，有的相互撕杀，争夺霸权。17 世纪

结束时，奥匈帝国强盛起来，但在德国却仍有 100 多个选帝侯 (Kurfürsten) 拥兵自据，至于更小的独立的邦国，据一位德国史家说竟多达 1500 个！^①

经济落后、竞争乏力是分裂的必然结果。1600 年和 1602 年，英国和荷兰先后成立东印度公司、大印度公司，法国也在 1664 年建立了东印度公司，但德国却长期没有类似的亚洲贸易公司，这主要是因为，没有一个德意志邦国拥有能为远航亚洲提供海上保护的力量。18 世纪初，流经多个德意志邦国的莱茵河上，所设税卡多至 32 个；一直到 1834 年，德意志各邦国才开始商建关税同盟，从而形成统一的市场。至于政治上完全破除诸侯割据，建立起统一的德国，是迟至 1871 年的事了。

2.2 路德——思想革命的先锋

尽管 17—18 世纪的德国在经济上落后于英、法等国，在思想上德国人却有着可以引以为豪的传统和理性的批判精神。要了解这种传统的形成，我们需要回到路德。

路德是德国思想史上第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做了两件伟大的事情。第一件是宗教改革，它使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历史都发生了转折。宗教改革起初完全是“德意志的运动”，^②德意志思想界的批评精神和理性主义倾向，在这场运动中初显锋芒。宗教改革源起于德国，显然是由德国的历史条件决定的。^③由于受到许多独立称雄的诸侯保护，新教得以在德国迅速传布开来，并逐渐播及北欧、西欧。路德宣布，对于基督徒来说，《圣经》才是可信赖的，教会则可能会犯错误。“信徒和上帝，犹如两个相爱的恋人，他们之间

^① 见 Werner Stein 编写的《文化史综览》1699 年栏，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77 年。

^②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 40 页，商务，1988 年。

^③ 可参看艾米尔·路德维希写的《德国人》59 页，三联，1991 年。

不需要第三者。”^①通过这种绝妙的比喻、生动的语言，路德使人民相信，他们事奉上帝完全不必依赖教会，而只须凭借他们自己的内心信仰以及合乎神道的理性思考。

这样的宣讲是教会无法容忍的。1520年，教皇下诏将路德革出教门。但是，德国的君主们却为路德提供了藏身之所，使他能够静下心来做他一直想做的一桩事——翻译《圣经》。这也是他做的第二件大事。早年他在维腾堡大学担任神学教授时，就发现被教会奉为定本的拉丁文《圣经》有许多错误，决心有朝一日要根据希腊文原本译出一部德语《圣经》。在他之前，已有20种版本的德译《圣经》，根据的都是拉丁文本。他用两年时间译成《新约》，又用12年译出《旧约》，一部直接依据希腊文本的完整的德文《圣经》终于面世了。^②

不过，这件事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区别，不在于路德纠正了多少拉丁文本的错误，而是在于他以这部作品动摇了教会不可怀疑的权威。他赋予了《圣经》德语的形式，从而也使基督教具有了民族形式。他用通俗的德语译出《圣经》，并用德语宣讲教义，使新教赢得了德国人民的支持。同时，他的译本促进了德语在文学和学术领域中的运用，在统一德语书面语、建立德语标准语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德国人民在路德的《圣经》中看到，自己的语言如此生动和丰富，毫不逊色于拉丁语，他们心中的母语意识于是被唤醒了。赫尔德曾经称赞路德说：“在德国，路德在这方面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是他解开了捆绑着德语这一沉睡着的巨人的绳索。”^③ 路德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拉丁文仍

① 同上书，79页。

② 现代德国福音派新教徒(evangelisch，别于katholisch，天主教，即旧教)，用的仍是路德的《圣经》译本。我手头恰有一本，1978年德国圣经协会版，扉页上印着：“《圣经新旧约全书》，据马丁·路德译本校正”。书后的时间表告诉我们：1522年9月，路德的德译《新约》在维腾堡出版；1534年，路德的德译《圣经》全书在同一地出版。

③ 见Erich Heintel编辑的《赫尔德语言哲学文集》143页，Verlag von Felix Meiner，1964年。

被公认是文明语言的典范,但其宗教语言的地位已经动摇。用任何一种语言都能赞美上帝,用母语比用外语更能传达内心的心声。

2.3 民族语文学的兴起

为考察 17—19 世纪的德国语言学史,我们也要退回一个世纪,从路德的时代说起。德国的语文研究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2.3.1 早期语文研究

16 世纪德国语文学的成果,举其大者,词汇方面有阿格里柯拉的三卷本《德语常用成语》(1528—1548),布斯贝克的《克里米亚哥特语语汇》(1589);语法方面有阿尔贝图斯的《条顿语语法或修辞术》(1573,这是已知最早的德语语法书),克拉尤斯的《德语语法》(1578);古籍考订方面有伏尔卡纽斯的《古北欧文碑铭辑录》(1597);通论或教科书有马勒的《条顿语》(1561),奥林格的《高地德语教程》(1574,主要讲句法)。

最后一本书的题目告诉我们,16 世纪人们已经注意到德语方言的差别。那时的“德语”一称涵盖的范围比今天要广。比如荷兰语,现在当然都把它看作是一种像德语一样独立的日耳曼语言,但在 16 世纪前后,荷兰语在许多语言学者看来却是德语的方言之一。荷兰人德·豪特在一本关于“低地德语”(Nederduits,当时指荷兰语)的正字规则的书里(《低地德语正字法》,1581 年出版于安特卫普),自豪地说到比法语更古老的“德语”(die Duitse tale),认为低地德语和高地德语都是其方言形式。另一位荷兰学者蒙塔努斯后来在 1635 年出版的《言语艺术》里也区分了高地德语和低地德语,二者应从属于一种“通用德语”(Duitse Hooftspræc)。^①

^① 见 Geert R. W. Dibbets 的《16—17 世纪荷兰语法家笔下的“德语”和高德语》一文,《语言学史论集》(*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Sprachwissenschaft*),1992 年第 1 期,19-40 页。

关于通用德语或德语的标准语应该是什么样子,是以一种特定方言为基础的德语,还是一种集中起各方言优点的理想的德语,是取上流社会通行的形式,还是以大众口中的形式为准,在以后两个世纪里始终是德国语言学者关心的问题。由于路德翻译《圣经》所用的维腾堡—麦森方言(Wittenberg-Meissnisch)为接受其教旨的人们纷纷效法,这种方言在建立德语标准语的过程中便有意无意地被当作一种范式。

2.3.2 寻溯德语的根源

中世纪,学者们无不相信,《圣经》原本所用的希伯来语是最早的人类语言,继之较早的便是希腊语和拉丁语。而包括德语在内的所有日耳曼语言都被认为是晚生的。这种完全基于书面文献的语言史观,在16世纪德国语文学兴起后开始受到质疑。阿尔贝图斯在《条顿语语法或修辞术》中提出,德语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语言,就简练精确而言仅次于希伯来语。克拉尤斯在《德语语法》里也声称,德语同希腊语、拉丁语一样古老;他甚至认真地推测,德语是在古人因建造通天塔而发生语言混乱的时候产生的。为此他试图从词源上寻找根据:(De) Askenas——诺亚长子亚弗(Japhet)的后代——是德意志人或条顿人的先祖,Deutsch(德意志,古拼Duiscones)或Teutsch(条顿,古拼Tuiscones)这一名称便是从De Askenas演变而来的。另一位神学家兼语文学者格罗皮乌斯·贝卡努斯走得更远。他也认为亚弗是德意志人的先祖,但他相信,只有亚弗一人才从诺亚及其祖先亚当那里获得了原初的语言,所以,德语应该比希伯来语还要古老,舍此再无人类初始的语言可求。^①

这些有关语言史的讨论在今天看来是那么荒唐武断,充满了臆测和想象。与之相伴的又有一种幼稚的语言价值观。阿尔贝图

^① 同上注。